

## 清代棚民的置产与入籍 ——基于徽州周家源文书的考察

黄忠鑫 王玉璐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周家源杨氏家族文书记录了19世纪棚民在徽州置买土地并定居的过程。1805年开始,杨氏棚民先与其他棚民合伙购买土地,后逐渐单独大量购置周家源山场,用于造屋、下葬及山林经营,成立了独立的纳粮户头。他们还被编入歙县的保甲体系之中。1834年分家以后,杨氏家族向周边继续扩大购地规模,增加山林经营的投入,并在休宁县开立图甲税户完纳钱粮。在传统徽州宗族村落之外寻求新的聚落空间,买地置产,加入各类户籍,都是棚民在徽州得以定居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棚民;土地;清代;徽州文书;户籍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1-0125-11

## Purchasing of the Real State and Naturalization of the Shed People during Qing Dynasty: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Documents of Zhoujiayuan in Huizhou

HUANG Zhong-xin WANG Yu-lu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Yang's family documents of Zhoujiayuan recorded the process of the shed people buying land and settling down in Huizhou in the 19th centu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805, the Yang's shed people first purchased land together with other shed people, and later gradually purchased a large number of mountain fields separately in Zhoujiayuan, which were used for building houses, burials, forest operations. And they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income tax account. They were also incorporated into the Baojia system of She County. After the division of the family in 1834, the Yang's family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scale of land purchase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eased the investment in forest operations. They also opened a Tujia tax account in Xiuning County to pay the money and grain. Seeking new settlement space outside of the traditional Huizhou clan villages, buying land and property, and joining various typ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e all-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shed people to settle down in Huizhou.

**Key words:** shed people; land; Qing Dynasty; Huizhou documen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清代开始,长江北岸安庆府的移民大量进入皖南低山丘陵地带,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徽州社会对棚民的反应不一,既有激烈的“驱棚”之举,也有默许接纳。“驱棚”之主张,往往指责棚民破坏风水、侵

[收稿日期] 2021-10-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74)

[作者简介] 黄忠鑫(1985-),男,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人文地理、明清社会经济史;  
王玉璐(1997-),女,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占土地,常见于官府及当地宗族文献之中。学界对棚民的研究也由此开始,主要探讨其山林垦殖活动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关系,并延伸到基层社会应对机制、话语权等问题<sup>①</sup>。实际上,清中叶以后有不少棚民聚落出现在传统宗族村落星罗的徽州各县,并延续至今<sup>②</sup>。这也表明棚民的类型、社会形象并不单一,有相当数量的棚民被徽州当地人接纳,成为“种地良民”。因而棚民合法置买土地、入籍定居的过程与机制都有待探索<sup>③</sup>。

近年,皖浙交界山区的周家源发现了一批家族文书,包括契约、税票、分家书、置产簿、族谱等,是直接体现棚民立场与话语的史料,颇为稀见。刘芳正等几位发现者已从宗族组织、土地交易、身份与代理人等角度进行了研究<sup>④</sup>。不过,周家源在清代属于歙县二十五都,与周遭的璜尖、清溪、札源等村同为嵌入休宁县的一处飞地。笔者已对璜尖等村进行实地考察和史料收集,其中璜尖程氏家族文书也有周家源的相关记录<sup>⑤</sup>。本文试结合两方的文书记录,以19世纪杨姓家族的置买土地活动为中心,对棚民在徽州入籍定居过程等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 一、杨氏棚民的家族发展与文书留存

杨氏棚民来自安庆府潜山县。周家源文书中现存一本名为“太原王杨家志”的族谱,其卷首《源流》记载了杨氏棚民家族的发展源流<sup>⑥</sup>。从中可知,杨氏一族祖籍山西太原,原姓王。因隋初先祖杰公有功于朝廷,赐姓为杨。后几经辗转,于元末迁入安庆潜山。但这本族谱主要记录的是潜山县王氏家族之构成情况。另有一本无名族谱抄本,其所载世系才反映了迁入徽州的棚民家族,一世祖为杨国乾,二世祖为国乾公长子杨恩连(字华周),这两代各只记录一人,其中在世系图上端有“蒙公次子”字样,表明杨国乾一系与潜山王氏的衔接。此后世系记录便从恩连公开始愈加详细,杨恩连共生三子:杨光照(字长

① 谢宏维:《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陈瑞:《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研究——以棚民营山活动为中心》,《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赵赟:《强势与话语:清代棚民历史地位之反思》,《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梁诸英:《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王振忠:《生态与生计: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王保宁、朱光涌:《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等等。

②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的时间脉络,时人归纳为:“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道光《徽州府志》卷4《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8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19页。卞利亦指出,“徽州各地自然村局面的被打破,主要是在乾隆中叶至嘉庆和道光初年”,其原因就是棚民大量涌入从而留下为数众多以“棚”为村名的自然村。氏著《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③ 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徽州地方社会对棚民的接纳。如日本学者涩谷裕子通过实地调查和口述访问,揭示了休宁南乡对棚民群体的接纳。参见氏著《清代徽州休寧県における棚民像》,山本英史编:《伝説中国の地域像》,东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233-241页。王振忠亦发现清末民国时期,祁门县西乡也有接纳棚民融入地方社会,并允许其参与寺庙管理、演戏出资等公共事务,还在学校中单列“棚籍”招生。(《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但上述研究中尚无详尽史料以证明棚民置产入籍的过程。

④ 曾小保、刘芳正、方光禄:《清代徽州棚民的来源与地方融入——以休宁周家源文书为中心》,《学海》2019年第3期。这批周家源棚民文书和族谱由刘芳正先生提供照片,谨申谢忱。后文征引中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该棚民家族文献。

⑤ 黄忠鑫:《山林经济变动与信贷契约书写的演变——清代歙县璜尖村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⑥ 王续兴编:《太原王杨家志》之《源流》,1988年翻刻本,不分页。

发)、杨光兴(字长泰)、杨光辉(字长青),光字辈以下分别为太字辈、似字辈、绩字辈。综合来看,族谱共跨越了六代人,时间范围大致涵盖了清中叶至民国年间。

除族谱外,周家源文书中保存的一份道光十三年(1833)杨季成父子分家书亦可以拓展我们对杨氏家族谱系的认知:

立分关杨季成所生二子,长曰恩连,次曰恩祥,俱以成人教书婚配。今人口浩大,家务难以总理,今凭族尊分折各爨,将祖遗外绩置田地、山场、什物等项,对半均分,拈阄为定。所有公借并放出账目,前议为据。□璜川当田,公全兴种,及周家源生山、竹木、松杉、桐子、棕树,连皮禾,分茶柯,公全蓄养,公取自分之。后各管各业,兄友弟恭,长发其祥,家道日新,人财昌盛矣。立此一样二纸,各收一纸,永远大吉存照。

道光十三年三月 日立分关杨季成(押),男恩连(押),恩祥(押)

这份文书指出了杨季成与上述族谱中的二世祖杨恩连及杨恩祥之间是父子关系。由此可以推断,一世祖杨国乾就是杨季成,即为蒙公次子。同时,璜尖文书中保留的一份嘉庆二十年(1815)的棚民保甲门牌,其户主是杨季年,并详细罗列了其家庭成员构成<sup>①</sup>:杨季年的子辈是杨德州、杨贵州、杨小牙和杨义四人,孙辈是杨上元一人。此外,门牌中还出现了杨季成的名字,并被标注为户主之弟。这一记载恰与杨氏家谱中的内容相对应,正说明了蒙公长子是杨季年,次子是杨季成。他们是一道来到徽州,成为棚民并被编入歙县保甲。杨季成的两个儿子也被载为“侄华州、祥”,亦与上述分家书相对应,即杨恩连就是华州(契约文书中还有作“华周”),杨恩祥就是门牌上的“祥”。由此可知,定居在皖浙交界山区的杨氏棚民家族之早期主要构成,是以杨季年和杨季成两个兄弟组成的联合家庭。而那本无名族谱抄本反映的则是杨季成之子杨恩连一支的世系,而这批棚民文书正是这一支派所保存的。

根据上述两份文书并结合无名族谱的世系记录,可以大体还原出杨氏棚民家族的构成(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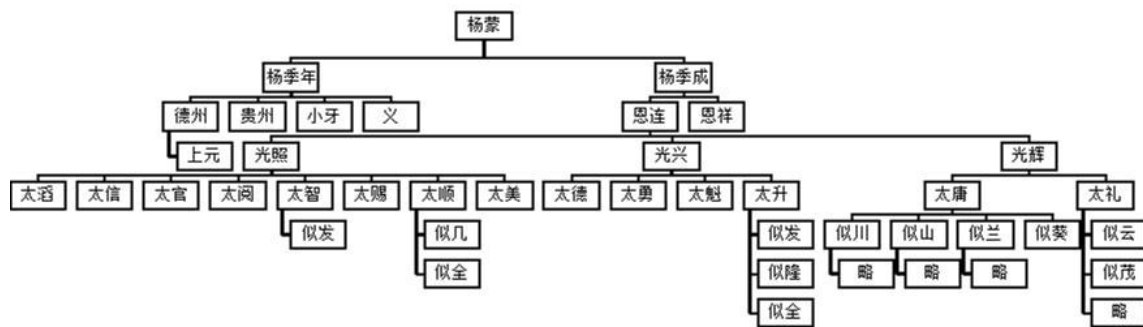


图1 周家源杨氏家族谱系关系图

门牌还显示,嘉庆二十年(1815),杨季年、杨季成兄弟在同一保甲门户中,说明这一时期二者尚未分家。从周家源保留的契约文书中可以发现,自嘉庆十年(1805)十月开始,杨季年开始参与周家源的购地过程,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买入的活动信息显示,这一时期,杨季年多与人合作购地,并逐渐开始独立购置产业。因此可以推断,嘉庆至道光前期是杨季年为首的棚民家庭在周家源购地并逐渐定居的主要时期。

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杨氏家族进行了两次分家。前揭《道光十三年杨季成父子分家书》已经展现了杨季成二子杨恩连、杨恩祥各立门户。另一份杨季成、杨贵州叔侄的分家书则反映了杨季年后代与

<sup>①</sup> 黄忠鑫:《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地飞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4-135页。

杨季成的分家：

立分关杨继[季]成同侄贵周[州]等，情因屡遭年歉，人口浩大，家务纷纭，一人难以总理。今凭族尊将周家源中山所有产业家资编立宪字号，品搭派分阄定，各管所有界抵，开列于后。自分之后，各管各业，毋得争论。立此一样二纸，各收一纸，永远发祥为据。

道光十三年三月 日立分关杨继[季]成(押)、全侄贵周[州]、翰先(押)、德普(押)、德和、上元(押)、见州(押)，凭族尊见廷(押)、殿传(押)、金传(押)

虽然两份分家书都仅将日期写为3月，但可以判断这份分家书应该略早于杨季成二子的分家，同时，由于族谱中没有杨季年的记载，亦可推知此时杨季年在此之前已经去世。这也就意味着保甲门牌中的户主过世后，家庭内部的秩序需要重新调整。而分家书中提到的“人口浩大”则显示此时定居的棚民家族的人口迅速增加，已超过了18年前保甲门牌所登载的组合家庭之规模。此时“屡遭年歉”，应有徽州连年水灾和波及全国“道光萧条”的影响<sup>①</sup>。因此，分家可以缓解经济萧条和人口压力，也可表明此时杨氏家族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综合内容来看，这批棚民文书是来自杨季成长子杨恩连一支，主要包括田产赋税、家族关系及诉讼等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文书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与地域性特征。棚民参与购地的时间始于嘉庆十年(1805)，集中分布于嘉庆至道光年间。这一时期杨季年及其长子杨德州是购买主力，土地主要分布于周家源，这反映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棚民迁入皖浙交界山区的热潮；道光十一年(1831)后，契约文书中杨季成长子恩连一支的角色愈加明显，他们购置的土地则多分布在与周家源接近的休宁县境内。可见，分家后的杨恩连等人向周家源周边拓展土地，逐渐扩展自身力量。

其二，19世纪初才进入徽州的杨氏棚民，其文书群中还包含了几份明末清初的契约，最早的是明崇祯二年(1629)的《吴一振卖休宁县木字号地契》。这些契约大都属于上手契，既有休宁县地方家族内部的土地交易，也有杨姓棚民以先典后买方式，从休宁吴氏家族获取土地的典契和买契，它们能够完整展示棚民购置土地的主要过程。通过土地字号和小地名(土名)的信息可知，上手契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成为棚民文书的一部分(参见表1)。

表1 杨氏文书中的上手契

土名	土地字号	交易时间	卖方/出当方	买方/承当方	交易性质
上屋	木4749	崇祯二年	吴一振	吴时华	卖
		顺治十五年	吴兆添户丁	同兴堂户丁三星	卖
上园屋	白4749	道光二十五年	吴以耕、吴大昌	——	典
上园		咸丰元年	吴以耕、吴大昌	杨姓	卖
住基一则		顺治九年	吴祥户丁祥保	吴天耀户丁天兆	卖
			吴祥生户丁祥保、六保		卖
上门住基	白4753	道光二十五年	吴以耕、吴大昌	——	典
		咸丰元年	吴以耕、吴大昌	杨姓	卖

① 根据吴媛媛的统计，道光十一、十二年(1831、1832)，徽州连续出现大水和饥荒，“田地二麦被淹”。参见氏著《明清徽州灾害与社会应对》，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2页。李伯重具体证明了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参见《“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崇祯二年(1629)卖契中的土地名称是木字4749号的“上屋”。在顺治十五年(1658)的契约中,土名和流水号均不变,但换为“白”字;道光二十五年(1845)当契则称该字号为“新丈”。这是因为,土地登记依据千字文加上流水号的规则,崇祯时沿用的是万历清丈开始实行的土地字号;清前期的顺治和康熙时期又经历了两次清丈之后,字号有所调整<sup>①</sup>。据笔者的复原,休宁县二十二都六图的字号正是从“木”字换为“白”字(参见表2)。

表2 休宁县二十二都各图土地字号在明清之际的演变情况

	一图	二图	三图	四图	五图	六图	九图	十图
万历	食	场	化	被	草	木	赖	及
顺治	王	鸣	凤	在	竹	白	驹	食
康熙	王	鸣	凤	在	竹	白	驹	食

在厘清字号演变情况之后,再看小地名(土名)的变化。咸丰元年契约里的土名是“上园”,但土地字号不变,应为同一处地块。该处土地经过吴氏家族内部的流转之后,此时从吴氏以先典后卖的方式,转移到杨姓棚民手中。类似地,同为白字号的一处住基,在顺治九年(1652)时同样是在吴氏家族内部交易,也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有吴氏当出,再到咸丰元年正式卖给杨姓。契约中的字号不变,土名亦略有不同。而咸丰元年(1851)二月吴以耕、吴大昌卖地契还专门标注有“当缴付上首来脚契、金税票共八张,交买人收执”的内容,说明伴随着土地的正式卖出,相关的上手契也一并交给了杨氏棚民。总之,这两组契约都体现了棚民与徽州地方家族间的土地交易过程,其最终结果是绝卖,由此也造成了杨氏棚民家族文书中出现了清前中期契约的现象。

## 二、杨氏棚民的置产兴业与定居

周家源原为璜尖程氏家族的山场。璜尖程氏家族的文书中,有一份乾隆六年的卖山契称,忘字号的周家源山场是“承祖遗下”的产业,买卖双方均为程氏,税粮过割亦在本家户内。此次交易的山税额共有1亩,价值纹银1.5两<sup>②</sup>。而在杨氏棚民的现存契约文书中,可见其最早购置产业的时间是在嘉庆十年(1805)十月。当时共立有4份契约,土地字号皆为忘字7664号,土名同为周家源(见表3)。

表3 嘉庆十年十月杨氏棚民置买周家源土地一览表

序号	卖方	买方	土地数量(折税亩)	价格(两)	均价(两/亩)
1	程世长	刘爵武、杨季年	0.340	4	11.8
2	程世长		0.050	0.8	16.0
3	程世坤		0.100	3.3	33.0
4	程世涵		0.015	0.7	46.7

这4份文书的买方信息中都有一位叫刘爵武的人,与杨季年合伙置买土地,且相应税粮也都过割至刘爵武户下。文书发现者刘芳正等人已指出刘爵武的角色值得探讨,但没有具体论证。笔者在现存契约文书中寻求线索,尝试解答。嘉庆七年(1802)刘爵武与璜尖程氏家族土地交易契约载称:

立杜卖契人程世长全侄日恒,今因用度不凑,叔侄商量,情愿将原买休邑来历山业一契,坐落土名周家源,系忘字七千六百六十四号,计山税二十四亩。其界东至清溪大降为界,南至龙

① 黄忠鑫:《明清徽州土地字号的分配与使用实态》,《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黄忠鑫:《山林经济变动与信贷契约书写的演变——清代歙县璜尖村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潭直上至尖,西至牯牛嶺中山大降直上,北至休宁界四界之内,大小土名不及细载,凭中出卖与刘爵武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时值价银休平一百两正。其银是身当日收领,其山听凭卖主上庄兴造作种,永远为业收税。其税在于本家程寿卿户内,听凭起推入受人户内完粮供差。及有分范不清,出卖人料理,不干受人之事。自卖之后,永不回赎,此系两厢情愿,并无异说。恐口无凭,立此杜卖契永远存照。

其号内共山税二十四亩七分四厘,除前契载出卖二十四亩,本家存税七分四厘祖坟。再批。(后略)

从这份契约来看,刘爵武向程世长购入一批周家源的地产,共计折合山税24亩,交易金额为休平银100两,由此折算每亩地价为4.2两。刘爵武所购置的土地数量十分可观,价格亦相对低廉。反观表3中他在嘉庆十年(1805)十月与杨季年的四则合买记录,土地税额和交易金额都远远少于其单独购买的数量,显得颇为零星,形成很大的反差。

再看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的一份并契,刘爵武及其侄刘西兰将周家源山场的四分之一转卖给杨季年:

立杜并契人刘爵武、西兰,今因用度不凑,叔侄商议,原将合伙杜买土名周家源等处山场亡[忘]字七千六百六十四号,通山派作四股,身得一股,载亩六亩一分三厘一毫。又田地、山场、屋宇、茶科、菜园等项,其界其山俱照老契管业,情愿凭中尽行并与杨季年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时值山价休平元银八十五两正。其银此日亲手领讫,其山听杨兴造蓄养,进屋居住管业。自并之后,永不赎取。及有钱粮,杨人交纳,倘在山股分不清,出并人料理。今欲有凭,立此杜并契永远存照。(后略)

根据契约内容,刘爵武、刘西兰叔侄将购入山地分成四股,自留其中一股,计6亩1分3厘1毫,由此反推周家源山场共有24亩多,恰与嘉庆七年(1802)卖契数额相当。这四分之一山场的价格为休平元银85两。另有一份同时时间的收字显示,刘爵武最终在杨季年处得到88两整,说明其中有找价的行为<sup>①</sup>。以88两计算,每亩山价约为休平银14.35两,远多于三年前刘爵武买入时的每亩4.2两。除了地价的上涨外,还可能因为本次交易除了山场外,刘爵武等人还将房屋、菜园、茶丛等一并包含在内,导致了价格的增加。

杨季年与刘爵武的最后一次交易,是在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

立杜绝推遗户。刘爵武全侄西兰等今将合伙原买七千六百六十四号,土名周家源,计税二十四亩五分零,通山四股,又田亩五分,身得一股。其大契该寔身名目股份以后复并与。今奈国课无办,叔侄商议寔身情愿凭中立契,尽行出卖与杨明光、季年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值价元银三十二两正,其银当日收讫,另不立收,其业听凭收税,上官交粮无阻。自推之后,彼此无得异说。恐口无凭,立此杜绝永远大吉为据。(后略)

该契约所载的交易对象,仍是刘爵武和刘西兰所有的周家源山场的四股之一,即6亩多,该比例与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并契所载的刘氏自留地块数量相当。与前次附带若干田地、屋宇、菜园不同,此次交易仅加上田亩五分,仍有再度索取找价的意味。总价是32两,平均每亩约为5两,也高于刘爵武与璜尖程氏的交易价格。“杜绝推遗户”的表述形式较罕见。“杜绝”本是绝卖契的说法,但随着找价行为的合法化,徽州地区形成了杜卖、永卖找价的乡俗<sup>②</sup>。刘爵武等人以无力缴纳税粮(“国课无办”)为由,将其所占

① 交易正价外的加价现象,即为“找价”,广泛存在于明清社会之中。明初徽州文书中已有找价的萌芽。参见刘森《明清时期徽州民田买卖制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② 卞利:《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有的部分周家源土地彻底转让给杨氏棚民。文书约定相应税粮亦一并推入杨氏户内,意味着找价后完成了绝卖。此后的文书中也没有了杨氏棚民与刘爵武的交易记录。这些土地产业则成为了杨氏棚民在周家源定居入籍的重要基础。

综之,刘爵武是杨氏棚民初入皖浙交界山区置产、定居时的重要人物。他先是购置了24亩周家源山场,又在9年的时间里陆续将其中一部分土地转让给以杨季年为首的棚民家庭,亩均价格从4.2两涨到19两之多。期间他还与杨氏合伙从璜尖程氏购置了零星产业,亩均价格则从11两至46两不等。刘爵武并非简单充当购地人的角色,而是起到中介过渡的作用,对接了杨氏棚民与当地家族。通过土地持有时间和亩均价格来看,刘爵武还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能够一次性大规模购地并尽快转卖获利。或许刘爵武是较早到来的棚民<sup>①</sup>,又或许交易的土地数量较多,故购置或转让的价格浮动幅度相对较小。他们从璜尖程氏直接购置的零星土地则亩均价格都高昂不少。而这些零星土地,也有可能是杨氏棚民为了完整持有周家源土地、便于集中管理经营而接受较高单价买进的。

杨氏首次独立与璜尖程氏交易,是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的卖山契,也是较高的单价置买山地,其文曰:

立卖契人程日权、程日桂全弟侄等今因缺少使用,自愿将祖父受到忘字七千六百六十四号,土名周家源,山税七厘,该身等分股之二,内取山税四厘六毛,凭中立契卖与杨季年名下为业。当日得受价银三两三正,其山听从执契管业,其税在本家户内完纳,不另起推。日前并无异墨等情,倘有内外人言,尽是出卖人支当,不干受人之事。恐口难信,立此卖契存照。其税日后起单,听凭推收过户无异。再照。(后略)

该产业中的山税仅为4厘6毛,交易金额3两,约为每亩65两,远远超过嘉庆十年(1805)的土地成交价格。这一情况或与嘉道时期徽州土地价格上涨有关<sup>②</sup>。同时,山的税率低于田地,因而交易的实际面积可能不小。

同年3月,璜尖村的三姓家族共同签订了一份禁止棚民租种、虚赔国课的合同,其中有严禁忘字号山业再度召募棚民租种的条款<sup>③</sup>。然至在9月,就出现了这份程氏族人与棚民的土地交易。这呼应了“棚民以高价租种山场,是以货币的权力侵蚀封建的土地权”的说法<sup>④</sup>,且杨氏棚民直接购入山地并立户纳税。可见,其具有一定资本<sup>⑤</sup>,绝非穷困潦倒、肆意侵占土地的“流氓”。

此后的3年间,杨姓棚民还与璜尖程氏家族有过几次土地交易,购置对象大部分为坟山(见表4)。

① 前人判断刘爵武是徽州土著。参见曾小保、刘芳正、方光禄:《清代徽州棚民的来源与地方融入——以休宁周家源文书为中心》,《学海》2019年第3期,第209页。但在璜尖程氏文书中,棚民相关的几份契约中可见到刘姓作为交易人或中人,故而推测其为早期棚民的身份。而在乾隆朝棚民进入之前,未见当地有刘姓与之发生交易。参见黄忠鑫:《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地飞地研究》附录《璜尖民间契约文书选编》,第153、164、175页。

② 对于清代徽州土地价格变动,已有一些学者已经做出相关研究。如彭超以歙县、黟县、休宁县作为研究对象,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土地价格变动与地租的关系进行探析(《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价格与地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和惠、汪庆元从徽州土地买卖的制度入手,系统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田土价格的变动,并探析其背后演变的原因(参见《徽州土地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5-222页)。

③ 黄忠鑫:《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地飞地研究》附录一《璜尖民间契约文书选编》,第147页。

④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⑤ 杨国桢曾通过一册嘉庆十八年祁门棚民租种紫溪源山场案卷,指出棚民一次能付出三百金或百余下金,“显非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棚民营山带有显著的商品化倾向。《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123页。但是,目前所有关于棚民的史料中,缺乏对其资本来源的记录。

表4 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14—1816)杨季年购置周家源山业一览表<sup>①</sup>

时间	地块名称	卖方	买方	土地数量(亩)	价格(两)	均价(两/亩)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	祖坟	程世涵	杨明光	0.01	0.35	35
	坟山	程世泽	杨季年	0.02	0.7	35
嘉庆二十年三月	山场		杨季年	0.0005	2.7	5400
			杨明光	0.0205	1	48.8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	祖坟山	程门元嫂	杨季年	0.005	0.5	100

总体来看,杨姓棚民直接与璜尖程氏交易的土地数量都比较少,单价较高。从交易情况来看,此时的土地价格仍有较大增长,甚至在嘉庆二十年(1815)的一笔土地交易中出现了仅5丝地(0.0005亩)卖出270文(约合2.7两)的现象,每亩折算地价高达5400两。而次年的坟山交易中,也出现了5毫地(0.005亩)卖500文(约合0.5两)的价格,每亩价格约为100两。这两块土地面积较小,单笔交易价格也相对较少,而折换的平均亩价却远远高于土地成交的正常价格。有学者研究指出,超常价格的土地一般分为三种用途:一是风水地,系为墓葬之用;一是房屋基地,或用于建房的土地;一是夹心地,即在自己田产范围内有一块他人之地<sup>②</sup>。由于风水堪輿在徽州的传统观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坟山的价格远远高于普通山场的价格。还可以推断,嘉庆二十年三月程世泽卖与杨季年的价格超常却数量极小的山场,可能也是一块“夹心之地”,在频繁的土地买卖或分籍中形成。

在这几笔购买坟地的记录中,还同时出现了杨明光与杨季年两人的名字。二人在文书中载为叔侄关系。虽然族谱中没有留下杨季年的生卒信息,但可以推断,杨季年可能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购地后不久去世了,此后再未见其出现在文书之中<sup>③</sup>。其长子杨德州则继续承担起在周家源拓展的责任。据契约记录,杨德州参与购地活动的时间始于道光元年(1821)二月,止于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共计11年,土地类型包括坟山及山场等。从土地字号来看,既有忘字7664号,亦包括忘字7663号,说明杨氏棚民逐渐向周家源周边地区进行拓展。

道光年间,杨氏棚民家族内部进行了多次分家(参见表5)。

表5 道光年间杨氏分家情况一览表

时间	产业类型	分家人员	亲属关系
道光十三年三月	田	杨季成、杨贵周	叔侄
道光十三年三月	田、山、什物	杨季成、杨恩连、杨恩祥	父子
道光十四年九月	田	杨季成、杨德普	叔侄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	田、山、房屋	杨华周、杨维周	兄弟

大部分分家书中的产业都明确标注为周家源,如道光十四年(1834)的分家议约就声明是“徽郡歙邑周家园产业立关分定”。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分家书却出现的是更小的土名,如“新屋”“老屋”的字样,其中,孝、友字号新屋对面田产的土名为“毛栗树”。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调换契中“祖遗分受周家园[源]己业,土名毛栗树凸一片”的记载,可知该次分家也是围绕周家源的土地进行划分。这份分单中杨华周(即杨恩连)一家共分得的房屋仅有“私墀东头从屋二间”及“槽门东头房二间”共四间。而从族谱所载其家庭人口的年龄情况来看,彼时华周长子光照业已成家并生子太滔、太信,次子光兴也已经成年,家

① 嘉庆十一年(1806)以后银价开始增昂,最终演变为“银贵钱贱”的金融问题。但本表中所涉的三年间,银钱比价尚未完全失衡,故仍采用1:1000的比例换算。此时期银钱比价波动情况,可参见王宏斌《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87、202页。

② 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209页。

③ 在前揭嘉庆二十年(1820)保甲门牌中,记载杨季年“年五十四”,其去世年龄可能是55岁。



中还有幼子光辉,还有两个女儿,整个家庭共计10口。其所分得的房屋和土地应该不足以承受庞大的家庭人口。同时,周家源一带的土地可供拓展的余地似乎不多了,所以他们在分家后逐渐向周遭的休宁县继续购置土地。

分家之后,契约文书中关于周家源土地交易的记载不多,仅有光绪二年(1876)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则,均发生于杨氏棚民之间。光绪二年的并契显示,卖方有三人,分别是杨上元、杨会元及杨雅俗,买方为杨长太(契约文书中还有“杨长泰”之称)。据图1所示,杨上元为杨德州长子,而杨会元与杨雅俗同为杨上元的胞弟,是为杨季年支系成员。根据族谱“公光兴,连公次子,字长泰”的记载,买人杨长太,实际上是杨恩连次子杨光兴,是为杨季成支系成员。由此可见,此次土地交易发生于杨季年与杨季成两支之间,其目的是供杨长太“作屋居住”。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的土地交易发生于杨有善与杨有为之间。族谱中,两人分别为杨太礼与杨太庸,均为杨恩连之孙。由此可见,晚清时期,周家源土地流转主要是在棚民家族内部。这一变化表明,杨氏家族主要通过契约交易的方式实现族内的土地配置。

### 三、棚民的户籍:从寄户到入籍的转变

杨姓棚民在周家源置产定居以及向周边地区继续扩张土地产业,需要相应的户籍登记并缴纳钱粮。以往的研究多注意到棚民定居后的保甲登记情况<sup>①</sup>,而对棚民进入徽州图甲户籍的情况较为忽视。杨姓棚民家族文书有相关的线索可以反映其入籍的过程。

在嘉庆十年(1805)十月的4笔土地交易中,有两笔标明在“本甲刘爵武户”完纳;另有两处山产则在“廿五都二图七甲程寿卿户内办纳”。次月刘爵武将大批土地并卖给棚民时,声称“及有钱粮,杨人交纳”,显然杨氏已具有承办赋税的能力。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杨明光、杨季年所立的议约声称,“纳粮当差,三股派出”,应为图甲纳粮事务的约定;同时还有“查棚还结门户个人自理”的条款,则属于保甲体系中的清查棚民事务。可见,杨氏在周家源置产定居后,需要面对图甲纳粮和保甲编查的事务。但此后棚民与当地璜尖程氏家族的交易文书中,税粮缴纳依旧挂在程氏户下。如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程日权等人的卖山契中称,“其税在本家户内完纳,不另起推”;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程世禹卖坟山契亦言“其钱粮本户内交纳”,等等。杨氏虽然继续购置周家源山产,这些零星地块却仍在璜尖程氏的图甲户内完粮。

从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程门元嫂卖周家源坟山契开始,则标注有“其山税听凭受人起推过户办纳无阻”,说明杨氏已拥有自己的纳税户头,极有可能承自嘉庆十八年(1813)刘爵武的“杜绝推遗户”。嘉庆二十五年(1820)六月杨德州、杨见廷、杨见怀等订立合同言:“其各项大契立户纳差,理当长房德州名目收领,永远不得争论。其纳粮当差各项外事费用三股派出,不得遗累一人。”说明杨氏家族确实开立纳税户头并共同承担责任。又如前文所述,杨氏家族在嘉庆二十年还有一件保甲门牌存世,住居载为“周家源棚内”,已有“自置山业”。由此可以推测,杨氏棚民应在这一年间同时开立了保甲和图甲户籍。道光十四年(1834)十二月杨继成、杨贵周等议约也有条款提到“每年应完国课二股交纳”,说明他们已经有较为稳定的依托家族缴纳税粮之机制。

休宁县南乡的二十三都、二十二都与歙县二十五都飞地内的周家源接壤或邻近。杨季成及其子孙从道光中期开始在这一地带陆续购置土地,这就触及跨县交易和税粮的推收过割问题。杨氏棚民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试以季成之子杨华周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购买山业契约为起点进行讨论:

二十三都二图立杜卖山契人孙文鼎,今因正用,自愿央中将祖存山业一号□□杨名下为业。其山系新文化字二千五百零六号,土名乌株树,计山税一厘二毛正,□□,明钉石为界。当

<sup>①</sup> 刘敏:《论清代棚民的户籍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日三面议定,得受时值价足兑纹银五两正,其银当日一并收足。其□□人管业,听从取用并[迁]葬。其税在于二十三都二图五甲程传兴户丁孙兰轩名下起□,□□同都图五甲杨敦义户内户丁华周完纳无异。倘有来历不明以及重复等情,□□之□,是出卖人承值。今欲有凭,立此杜卖山契存据为照。(后略)

此次交易后税粮由在程传兴户推入至杨敦义户的户丁华周,似可进一步证明杨氏棚民拥有了图甲户头。但契中所言的二十三都二图,是休宁县的都图单元。另有一份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休宁县颁发的易知由单同样记录了“廿三都二图五甲一户杨敦义户丁华周”应纳钱粮之情况,则可以确认杨华周所购置山场在休宁县。根据清前期形成的休宁都图文书记载,二十三都二图七甲的总户名是“杨敦义”,居地是浯田,而五甲的总户名是“程传新”,居地是几山头<sup>①</sup>。契约中的五甲程传兴户与都图文书相同,卖方孙文鼎在该总户下有一个孙姓子户(户丁);杨华周同样是户丁之身份,其所依靠的杨敦义户本应为七甲总户,但无论是私契还是官方的由单都记录为五甲。这里的杨敦义户或为程传新户的子户、又与七甲总户重名,但契约表达结构是“总户+户丁”,则“杨敦义”应为总户,属于契约和由单的记载错误。这两种可能限于史料暂不讨论。此处可以确认的是,杨姓棚民已经通过置买产业在休宁开立了税户。

次年12月,杨氏又从休宁二十二都六图吴以耕等人购置3块“久已成田”的“祖遗下基地”。这笔交易先是“尽行立当与廿三都二图杨名下为业”,共得当家5元银洋。交易之后“其田即交受人管业,其税原在本家户内,自愿完纳,毋容起推”,受受人存有吴氏的仝税票,代吴氏交纳赋税。六年后的咸丰元年(1851),吴杨双方订立绝卖契,正式完成了这3块土地的所有权转移:“得受时值价足兑曹平元银六两整。其银当日亲手一并收足,其地即交受买人管业,其税即在本都图十甲吴祖福户内起割,推入二十三都三图八甲杨同兴户内办纳粮差,各无异说”。这两张契约中的买方所在图甲户籍信息有所区别:当契的承当人属休宁县二十三都二图,而卖契中的买人则属二十三都三图,户头为杨同兴,这一变化可能与杨恩连所属图甲组织的变化有关。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的休宁县易知由单显示,杨氏的图甲户籍发生了变动:“廿三都三图八甲一户杨同兴户丁华周”。此时,杨恩连所在图甲,由原先的二十三都二图五甲演变为二十三都三图八甲,户头也由杨敦义变为杨同兴。在道光二十八年后,杨氏家族文书中亦不复有杨敦义户的记录,交易土地大多推至杨同兴户下过税缴纳。由此可以推断,彼时杨恩连已停止在二图杨敦义户下纳税,在三图另立户头。新户“杨同兴”应为虚拟户名,而在都图文书记录中,其所在图甲的总户为“程九章”户,居地在塘下,因此杨同兴户应当是该户下的子户。

族谱还显示,杨恩连(华周)在同治二年(1863)去世。但契约中的图甲信息仍保留他的名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一份卖契中就出现“其税……即行迟割推入于同都三图八甲杨同兴户丁华周名下办纳粮赋无异”的字样,正说明了后人仍以杨恩连之名作为纳税户头,用于过割税粮。

同时,杨恩连死后,其次子杨长泰的身份也发生转变。在同治七年(1868)的卖契中,买人杨长泰等人仍属休宁县二十三都三图。而在次年的契约中,杨长泰却成为同都八图十甲操元茂的寄丁:

二十三都八图十甲立杜卖地契人程明德,今因钱粮急用,自愿央中,将承祖遗下地业一宗,坐落土名前圩墩上,字号、税亩列后。其大四至悉照鳞册分明,凭中立契出卖到杨 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得受时值卖价计足兑曹平纹银八两二钱整,其钱比即随手收足,其业即交与受买人管业。小四至东至本家坟地,西至吴姓坟臂,南至田,北至本家地,钉石为界。四至内听从扞造、风水开穴取用。其税粮自二十三都八图十甲程章大户内起割,推入于本图本甲操元茂的寄丁杨长太[泰]内纳粮差无异。其业未卖之先,并无重复交易。自卖之后,倘有内外人言,及一切不明等情,是出卖人承值,不涉受业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杜卖地契永远存据。(后略)

<sup>①</sup>《休宁都图里役备览》,安徽省图书馆藏,康熙朝以后抄本一册,书号:2.30710。后文提及的都图文书信息,亦出自该文书。

对于该“寄丁”的解释,前人认为是一种对于徽州棚民的称呼,即他们虽具有了交纳税粮的权利,可在迁入地徽州仍被视为安庆人,是不稳定的寄留民<sup>①</sup>。根据前文的梳理,杨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已于休宁县购置相当数量的土地并开立税户,应该不能算作“不稳定的寄留民”,且“寄丁”的说法仅见于杨长泰一例,而在契约文书中的杨氏家族其他成员并未见有这样的表述。

笔者还注意到,同治六年(1867)的卖契中,买人杨长泰、杨长久仍属休宁县二十三都三图杨同兴户的户丁。从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与二十三都八图程明德以及吴式之的土地交易,再到同治九年(1870)向程吉甫购置的部分土地中,杨长泰都是以操元茂寄丁的身份进行交易。3笔交易的对象土名均为前圩墩,字号是万字1616、1617两号,均属坟茔之地。此后,又根据一份同治十二年(1873)的收税契记录,杨长泰将两处万字1616号的土地推入杨同兴户内。查阅都图文书的土地字号与都图的对应关系,万字号属休宁县二十三都八图,恰为交易人程氏、吴氏及操元茂所在的图甲户籍。由此可见,杨长泰在契约中身份表述的转换,或出于置地之便的考虑,即为了方便在其他图甲购置坟地,遂以“寄丁”身份完成交易和推税。此外,从族谱所载杨恩连次女“适操公定国”可知,杨、操两姓存在姻亲关系,这也是杨长泰能够在操氏户头之下寄税的重要原因。操姓不是徽州的主要姓氏,多见于来自江北的棚民。操、杨之间的联姻和寄税,应是基于棚民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

由此可见,伴随着土地购置过程,杨氏棚民从在二十三都二图五甲子户杨敦义户下开立更小的子户,到三图八甲新立独立的子户“杨同兴”,再到杨长泰成为八图十甲操元茂户的寄丁,都体现了其在图甲户籍中的变动情况。

## 结 语

综上所述,杨氏棚民的定居以嘉庆十年(1805)至道光十一年(1831)在忘字号的周家源购置山产土地为起点。他们经历了由通过中间人合买到单独与当地家族交易的过程,购地主体为杨氏长房杨季年及其子杨德州,置地对象包括居住、生计及坟茔之地。这些土地为杨氏家族的定居与发展提供最初的生存空间。随着杨氏家族的逐渐壮大,道光十三年(1833)后进行了几次分家。为了扩充生存空间,杨季成一支向休宁县继续发展,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土地。

从杨氏家族的案例来看,与同时期来到徽州山区却遭驱逐的穷苦棚民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在定居伊始就已具备若干资本,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确保购置土地的合法化,且大部分交易都属于绝卖性质,使得杨姓棚民能够在徽州山区稳定地定居并不断发展。这种市场化的行为对于重新审视清代棚民的地方社会融入及土地交易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着土地购置,杨姓的棚民也较为顺利地融入到徽州的图甲、保甲等户籍管理中。杨氏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在图甲体系中,主要是以子户、寄丁的身份,挂靠在地方家庭的总户之下。这正体现了图甲“总户——子户”结构,总户往往是由地方大族所控制,诸多子户相对独立。由此图甲仍能吸纳众多人户进入赋税组织体系之中,通过开立子户实现土地产业的过割与纳税,并获取合法证明。在保甲清查中,杨氏棚民家族除有真实人口的登记外,还有自置土地的标注,同样巩固了他们扎根徽州地方社会的局面。在传统徽州宗族村落之外寻求新的聚落空间,买地置产,加入各类户籍,都是棚民在徽州得以定居的重要契机。

(责任编辑:李良木)

<sup>①</sup> 曾小保、刘芳正、方光禄:《清代棚民的来源与地方融入——以休宁周家源文书为中心》,《学海》2019年第3期。